◆杂　谈

台湾高校倒闭潮来临

由于多年的盲目扩张，加上近年来的少子化趋势等因素影响，台湾百余所高校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

为了应对这一燃眉之急，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不得不祭出“退出机制”，责令部分高校加速整改，否则就关门歇业，停止办学，或者只有与其他学校合并，才能继续生存，这也大大加快了岛内大学整合的步伐。但在岛内社会被严重撕裂，任何议题都有可能被高度政治化操作的特殊氛围中，台湾高校整合的前景不容乐观。

表面看来，少子化现象是造成台湾高教危机的最重要诱因。近年来，台湾生育率大幅下降，少子化影响逐渐凸显，直接造成岛内高校生源不足，招生缺口日益拉大。但如果从更深层次来看，台湾高等教育之所以会危机重重，则是其20余年盲目无序扩张的结果。1994年至2005年间，台湾力推高等教育普及化政策，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广设大学”，在全台各地以升格或成立新校的方式广设大专院校，使之数量瞬间暴增，由最初的23所猛增至120所，在校人数也随之急剧增长。大学教育从精英走向普及，这固然有利于提升台湾民众的整体素质，也为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但更衍生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台湾人才素质正在逐年拉低，呈现出明显的研究生本科化、本科生高中化的现象。大学数量泛滥，直接造成生源质量大幅缩水。前些年曾有一名学生以总分8分的成绩就能考上大学，这在全世界来看，或许都是一个“奇葩”。而英语单科不足10分，却能进入大学英语专业学习的学生，更是比比皆是，举不胜举，其门槛之低，由此可见一斑。由于学校招生门槛过低、毕业生素质自然也会日益低落，根本无法达到用人单位要求，于是就出现了人才供需失衡的悖论性结构，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根本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是企业无人可用，闹起“人才荒”。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许多本来应该踏入社会的大四学生不得不选择往后延迟，以化解无业可就的尴尬，期许拿到一个更高学历后能有一个更好的就业前景。根据台湾近年的一份调查显示，有61%的学生因为“工作不好找”，而选择了继续学习深造。过去数十年间，台湾博士生增加了3倍，要想全面消化这批数目庞大的“库存博士”，估计就业市场得需要20多年时间。（2016年3月2日《法治周末》钟厚涛）

宋代的“环保”理念

“环保”“绿色”是现代概念，但谈不上是现代观念，而是古已有之的传统理念。宋代延续前代的做法，设有专门的环境保护部门——虞部，各州县又设“农师”之职，聘请通晓农林知识者担任之，为民众种植作物、林木提供技术指导。朝廷还制定一系列涉及生态保护的法令，如宋太祖曾下诏：“令民二月至九月无得采捕虫鱼，弹射飞鸟，有司岁申明之。”又严禁捕食青蛙，因为宋人已发现青蛙乃庄稼害虫的天敌。这一立法大概是最早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之一。

宋政府对绿化尤其重视。我们展开《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到，不管是郊外的道路两旁，汴河沿岸，还是繁华都市内的街道两边，都是绿树成荫。这当然是宋政府大力推广绿化的结果。

宋太祖立国之后，即诏令沿黄河、汴河两岸的州县，必须多种植“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民欲广树艺者听”。因为植被能够巩固河岸、堤坝。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朝廷任命谢德权领护汴河，谢德权即调征夫役，在京师河段“植树数千万（株），以固堤岸”。难怪后来日本僧人成寻来中国旅行，乘舟至汴河时，看到沿岸皆“杨柳相连”“榆柳成林”。

我们现在习惯在公路两旁种植林木，宋人也是这么做的。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一位官员发现“诸路多阙系官材木”，便向朝廷提了一个建议：可令“马递铺卒夹官道植榆柳，或随地土所宜种杂木，五七年可致茂盛，供费之外，炎暑之月，亦足荫及路人”。宋真宗批准了这一建议。宋仁宗时，陶弼在阳朔当县令，“课民植木官道旁，夹数百里，自是行者无夏秋暑暍之苦，它郡县悉效之”。

宋朝地方官若在任内积极植树造林，是可以作为升迁之政绩的，《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诸县丞任满，任内种植林木滋茂，依格推赏，即事功显著者，所属监司保奏，乞优与推恩”；如果导致绿化面积减少，则要受处分，“任内种植林木亏三分，降半年名次，五分降一年，八分降一资”。政府又立法严禁盗伐林木，“违者置罪”；即使是官方出于公共用途要砍伐木材，也必须向“都木务”申请采伐许可。

宋人对环境保护的注意，既有传统环保理念的延续，也有宋代社会现实的压力所致。宋代手工业发达，特别是煤炭的大量使用，导致空气污染，如延州普遍以煤（石炭）为日用燃料，整个城市笼罩在煤烟之中：“炒堆套里三条路，石炭烟中两座城”。宋代生齿日繁，对土地、林木资源难免出现过度开发之趋势，这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与生态破坏。别以为只有今日的北京才有“沙尘暴”，宋代文献中即多次出现扬尘天气与雾霾天气的记录，严重者，“暴风起西北有声，折木吹沙，黄尘蔽天”。换言之，跟之前的任何王朝相比，宋朝人面临着更为迫切的环保压力，不能不更加重视环境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宋朝“现代性”的表现，因为在“近代化”展开之前，人对自然的破坏力是非常有限的。（2016年3月7日《北京日报》吴钧）

◆观　点

如何认识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

我国有13亿多人口，让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地区以同样的速度富裕起来是不可能的，也不现实，平均主义只能导致共同贫穷。只有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才能带动更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在这一政策的鼓励和指引下，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越来越多的人口走上了富裕道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当前我国低收入者数量虽然庞大，但已经大幅度减少。据统计，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有2.5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而到2014年底，在贫困线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则为7017万。而且，即使是贫困人口，其生活水平与以前相比也有极大提高。以前的贫困更多表现为缺衣少吃，现在的贫困更多表现在缺少现金收入。因此，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是绝对差距，即一部分人收入提高了，另一部分人收入降低了，而是相对差距，是在共同富裕道路上有快有慢、有先有后的差别。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出扩大趋势，当前是否已达到最高点并开始下降呢？综合判断，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越过倒U曲线顶点并进入右侧，未来将呈现继续下降的趋势，理由如下。

第一，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诸多指标都已呈现下降趋势。一是基尼系数。一般而言，当基尼系数小于0.3时，意味着收入均等或出现平均主义分配；0.3～0.4时，收入差距比较合理；0.4～0.5时，收入差距过大；超过0.5时，意味着出现了两极分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基尼系数2008年达到0.491历史最高点之后，随后几年呈现连续缩小态势，2015年为0.462。二是城乡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波浪式但总体扩大的变动趋势，2009年达到3.33倍的历史最高位之后，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15年为2.73倍。三是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经历了扩大趋势之后，近年呈现缩小态势。从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之间的收入差距来看，2015年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为2.3倍，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为3.36倍。如果考虑不同区域间的物价因素，实际的购买力差距会更小。四是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最高与最低收入行业之间的差距已从2008年的4.65倍下降为2014年的3.86倍。由上述指标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总体呈缩小趋势。

第二，生产要素供求关系的变化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要素市场总体呈现资本短缺而劳动力过剩，土地和环境近乎无限供给的状态，收入分配必然向资本倾斜，劳动报酬长期偏低。近年来，生产要素市场供求状况发生明显变化：资本过剩，劳动力总体供不应求，土地供给受到极大限制，环境容量遇到天花板。由此带来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提高，资本利润率降低。劳动力供不应求特别是城乡有一技之长的劳动力严重供不应求，导致劳动力价格将呈现持续提高趋势，从而有助于改善劳资之间的分配结构。

第三，城镇化及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弱化将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以每年约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到2015年已达56%，未来20年还会以较快速度增加。这一方面意味着更多的农民到城镇就业，获得更高的收入。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镇就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人口拥有更多的土地等资源，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导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二元经济和社会政策因素将随着改革的深入而弱化直至消失，城乡居民享受的公共资源进一步均衡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会持续缩小。

第四，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以及其他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经济将呈现快速发展趋势。近两年，重庆、贵州、西藏、新疆等地区发展速度超过了东部地区就是例证，这也为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奠定了基础。

第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进一步到位，通过严厉打击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健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将会进一步缩小。（2016年3月23日《光明日报》赵振华）

去产能事关供给侧改革成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五大任务，去产能排在第一位。从五大任务的内容来看，去产能也应当是名副其实的首要任务，或者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问题。

这是因为，其他四个方面问题的产生，都与产能过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库存问题，毫无疑问是房地产市场产能过剩的结果，去库存也是为了去产能；杠杆问题，则与前些年盲目发展、无序发展、过度发展、负债扩张密切相关，去杠杆，就必须先去产能；成本问题，无疑是产能严重过剩下对资源的过度争夺和占用造成的，如果产能过剩问题不解决，降成本难度也很大；短板问题，则是因为产能过剩行业占用了太多社会资源，导致许多应当重点发展的领域反而变成了短板。

这也意味着，去产能效果的好坏、效率的高低，将直接决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败。如果去产能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其他四个方面的问题解决得再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难言成功。反过来，如果去产能问题解决好了，其他四个方面问题的解决难度也就小得多。

众所周知，自进入21世纪以来，去产能就一直是经济工作的重点。特别是2003年对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实施的宏观调控，更被认为是打响了去产能的第一枪。遗憾的是，由于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没有统筹兼顾，不仅没有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反而使钢铁、水泥等行业进入了新一轮快速增长期。此后的几次去产能调控，也因为政策上的顾此失彼，导致去产能工作陷入越去越高的怪圈。

也正是因为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带来了经济结构越来越失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越来越难。更重要的，它造成了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失衡，使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大大下降，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大大降低。

中央决定把工作重点转向供给侧并提出五大任务，是完全符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去产能则是问题症结所在。只要产能过剩问题一天不解决好，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就一直存在，其他方面的矛盾就很难得到化解。所以，去产能必须成为结构性改革的靶心，成为五大任务的核心。

在实践中，去产能首要的是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最为紧迫的任务。“僵尸企业”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并成为市场供应的强大阻力。不把处置“僵尸企业”的工作做到位，去产能要想达到目的，难度很大。要注意的是，由于“僵尸企业”主要分布在国有企业，且大多块头大、员工多、负债重，如果不加大改革力度，处置的难度也是相当大的。所以，一定要加大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通过改革清理、处置一批“僵尸企业”，达到去产能的目的。

在去产能过程中，还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除“僵尸企业”的处置适当加入一些行政手段之外，其他方面一定要以市场为抓手，通过市场手段进行调整，政府不要再用行政手段对市场过度干预。尤其是地方政府，不要对产能过剩行业予以保护。同时，一些产业明显偏重的地区，可能因此而出现经济增长下滑、财政难以运行的问题。对此，要在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予以支持，鼓励这些地区做好去产能工作，避免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2016年第1期《群众》谭浩俊）

◆评　论

寻回并发扬『工匠精神』

提到“工匠精神”，我们也许首先想到的会是德国、瑞士、日本这些国家。其实，在我国古代，“工匠精神”也是非常突出的，有“精益求精”的成语，有鲁班、庖丁等“工匠精神”的典型。这说明，在人类的工艺设计和制造史上，不论区域和文化有着怎样的差别，在追求精致、卓越、精美、典雅等充分反映人类文化审美创造力方面，东西方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因为它代表了人类追求极致和完美的美学理想。

基于文化的属性和发展的形态不同，东西方的“工匠精神”在具体的表现样式上，也存在着一定差异。相比较而言，东方文化（主要以中国文化为代表）侧重于对柔性要素的重视，在设计和制造上，为追求完美和极致，多强调不惜花费时间精力，反复揣摩，孜孜不倦，匠门意象，依天工而开物，观物象而抒臆，法自然以为师，毕纤毫而传神，既体现出一种精益求精的功能特点，也展现出一种典雅优美的审美特点。如在建筑上，中国传统建筑的设计和建造，在体现实用功能的同时，也追求天人合一的宜人性的审美功效。

而西方文化（主要以欧洲文化为代表）较为侧重对刚性要素的重视，在设计和制造上，非常强调对产品质量的高标准，要求必须确保每个部件质量的上乘，对产品采取严格的检测标准，无论是使用的材料、设计还是生产流程，都要求优质高效。特别是进入工业化时代后，采用标准化的规模生产，对产品的质量提出了统一的严格标准，以打造本行业最优质的产品。如英国航海钟发明者约翰·哈里森费时40余年，先后造出了5台航海钟，其中，以1759年完工的“哈氏4号”最为典型，在用于航海实验中，总共64天，只慢了5秒，远比法案规定的最小误差（2分钟）还少，完美解决了航海经度定位问题。

很多人认为工匠是一种机械重复的工作者，其实，工匠有着更深远的意义。他们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气质：坚定、踏实、严谨、执着、专注、敬业、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工匠不一定都能成为企业家。但大多数成功企业家身上都有这种工匠精神。

有人说，这个时代“工匠精神”已经缺失了。其实应该说，真正的“工匠精神”是不会消失的。在工业4.0时代，应该说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工匠精神”，所以，在今天，大力倡导“工匠精神”是非常有必要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营造崇尚专业的社会氛围，大力弘扬新时期工匠精神”。

“互联网+”时代，倡导“工匠精神”与创新精神，本质上是一致的。如果说互联网思维表现为开放、创造、创新，“工匠精神”表现为严谨、精致、专注，那么，二者的融合所发生的就不是一种简单相加的物理效果，而会是一种化学反应。“工匠精神”以最开放的姿态来吸收最前沿的技术，从而创造最新的成果。它不是一味地恪守传统而裹足不前，恰恰相反，是善于用创新的精神，对产品精雕细琢、反复对比，找到最好的结果，体现出最大的价值。在我看来，即便是做互联网产品，如果没有“工匠精神”做基础，也不会产生创新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如今，我们倡导“工匠精神”，首先，是要文化上进一步弘扬“中华文化”的传统，全方位地将追求唯美（完美）、精致的精神贯穿在互联网时代，让这种文化真正地深入人心。其次，是要在制度的设计上，处处都能体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少一点急功近利，多一点细心缜密，无论是互联网的实体企业，还是虚拟产品，都需要将这种“工匠精神”贯穿其中，这样才会让企业、产品，真正具有一种品质。再次，就是让“工匠精神”能够成为每一个员工的自觉追求，做到凡事都去追求99.99%，甚至100%，而不是“差不多”，马马虎虎，将这种精神作为一种做人做事的态度，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这样，在互联网时代，在“中国制造2025”的关键契机下，以重拾“工匠精神”，以极致的产品和服务，打造出中国制造业“互联网+”的示范标杆，成为一种卓越企业和产品的标识，就不会成为一句空话了。（2016年3月21日《理论周刊》黄健）

◆视　界

德国经济的“欧洲领导梦”

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各国受金融危机影响普遍陷入经济的衰退，尽管德国也不例外，但是，很快德国便进入经济的恢复期。学者们在总结德国经济恢复的经验时，无疑将其经济结构中的制造业作为主要原因。然而，欧盟，特别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拖累、欧盟内部的不稳定、难民潮等问题也困扰着德国经济的发展。

德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应该说，欧洲的渐进一体化过程，也是德国逐步担当起欧洲领导者角色的过程，但是，目前德国的发展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货币一体化尚未实现与财政一体化难以实现，这成为发展实体经济的根本难题。德国希望通过欧盟成员国的经济一体化实现经济和货币联盟。在此过程中，实现欧盟的统一货币，使各国经济在统一的货币和货币政策下，避免各成员国发展步伐的差异影响欧盟的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借助渐进的财政一体化，使各成员国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向和程度保持高度的一致，从而使货币和财政政策统一。这种统一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包含着德国的基本理念，即欧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正常发展的基础上，而这种正常的发展又是建立在科技创新、发展制造业竞争力的基础上，而这种发展路径无疑是由德国引领的。然而，这样一种思路目前是难以实现的。

首先，在统一货币问题上，目前还有九个成员国没有加入欧元区，这就意味着统一的货币政策还没有完全实现。其次，即使加入了欧元区的成员国也与德国“同床异梦”，希望从一体化中得到更多融资和债务担当，结果导致了“笨猪五国”的主权债务危机，震荡了整个欧元区。德国的解决办法还是高瞻远瞩的，一方面，必须严格财政纪律，并借此推动欧盟财政的进一步一体化；另一方面，通过借款方式，维持欧元区乃至欧盟的团结一致，使欧盟不受到系统性冲击。在财政一体化方面，进展还比较缓慢，核心问题是欧盟各国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还没有发展到各国完全放弃经济自主权的程度。因此，必须在震荡中，成员国逐步接受放弃经济政策自主权。这也是德国迄今为止所做的事情。

德国所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欧洲难民潮问题。从历史上看，欧洲曾经在经济大发展的20世纪50-60年代出现过南欧和阿拉伯劳动力进入中北欧国家从事工作的情况，主要原因是那里的劳动力奇缺。1985年以后，由于欧洲失业问题严重，曾经采取过鼓励外来劳动力返遣的政策。本次的移民潮是一种“非志愿难民”。这是突发的，但德国却是非常积极接纳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德国人感同身受，回顾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德国人抱着强烈同情的态度处理难民潮的问题。二是从经济学角度看，德国要进一步发展制造业，必须有大量的劳动力供应，而德国乃至欧盟整体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始终低下，没有改观。德国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劳动力出生的政策刺激，但效果有限。本次德国带头接纳80多万难民，不能不说，德国需要这样的生力军，如果利用得当能够成为“意外之财”，成为新的劳动力供给，况且可能是低成本的劳动力供应。然而，如果利用不当，则可能是令德国人头疼的事情。因而，逐步地“调教”这些劳动力，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德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第三个挑战是欧盟经济的拖累。从欧洲一体化的历史看，欧盟是通过牺牲经济发展速度换取一体化的渐进升级和扩大的。因此，在我们看来，德国的理念是经济的乃至政治的一体化，一个统一或“和而不同”的欧洲才是德国追求的主要目标。

德国经济发展经验的世界启示

从德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我们能够思考很多问题。从总体看，一个国家经济，特别是大国经济的发展一定要坚持以制造业发展为基础的原则。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开始，德国人就坚持认为产品的制造能力相比制成品而言不知要重要多少倍。因此，形成自身的工业产品生产能力，从而形成不断创新、引领工业制造方向的能力，才是最根本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在自身的金融体系尚未发展和完善起来之前，必须将金融建立在自身制造业发展的基础上，即金融是建立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并且发展金融必须以制造业发展为前提。

第三，强调经济发展的渐进性，打好经济发展的基础。不要以大跃进的方式发展制造业，要更多地建立起科技创新的机制，把先进制造业长远发展的国家规划与企业的活力密切结合。（2016年2月下《人民论坛》佟家栋）